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全球化视域下的 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 姜英敏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全球化视域下的 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 姜英敏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国际教育前沿丛书

全球化视域下的 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 姜英敏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姜英敏编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440 - 9174 - 9

I. ①全… II. ①姜… III. ①教育政策 - 对比研究 - 世界 IV. ①G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717 号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QUANQIUHUA SHIYU XIA DE GUOJI LIJIE JIAOYU ZHENGCE BIJIAO YANJIU

责任编辑 康红刚
复 审 邓吉忠
终 审 康 健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蔡 洁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 -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立方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9174 - 9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7053772。

总 序

—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目标，力图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二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正在进入知识经济阶段。与建立在土地和人口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资本和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知识、技术和信息发展靠创新、靠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因此，教育成为各国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首要途径。三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影响、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学校之间的竞争，世界各国都把创建世界一流的学校、提升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作为战略目标。四是信息技术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际社会大变革把教育推向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

心，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性的运动，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则是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主旋律。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不仅是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所带来的挑战的应对，也是基于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纵观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世界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改革。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所推动的社会全面变革引发了以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标志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进步主义教育直接向传统教育宣战，强调把儿童的兴趣作为教育的出发点，重视职业教育、工业教育、科学教育，倡导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使人们反思传统与变革、人文与科学、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民主运动、人口剧增和“冷战”加剧等因素的推动下，以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为导火线，爆发了新一轮世界性的教育运动。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一度给教育带来一缕新风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及其改革运动，结构主义、要素主义教育理论逐渐取代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取得支配地位，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改革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加强大学的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为国际社会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和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使教育的地位空前提高，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因70年代的经济萧条戛然而止，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教育运动是上一轮教育改革运动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发展。在中小学教育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背景下，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变成了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也就是为每一个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确立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的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加强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提高教师的待遇和专业化水平，建构终身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进程，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与以前的局部改革不同，这是一场教育的全面改革，涉及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程教学到

管理体制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与以前阶段性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更是一场长期的教育改革，已经持续30年的教育改革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实现转型，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大变革和国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的双重压力，既处于新的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总结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我们审视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几乎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指向2020年这个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年份。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社会迎来更大的变革，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国的崛起；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教育，探讨教育如何适应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改革创新，为国家整体战略服务。

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改革大势相一致，中国教育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在新的世纪，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宣告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始，我国教育进入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时期。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变革还是教育变革，在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从国际社会寻找可供借鉴的理论、经验和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我国教育科学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特别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把视野扩大到国际社会，研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政策措施、得失成败，研究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尤其是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相应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

三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创立于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最早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构。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专业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专业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88年，被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是比较教育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1999年12月，成为第一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15家科研机构之一，是比较教育学科

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2011年秋季，招收第一届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研究生，开创了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国际硕士教育的先河。2012年，与奥地利、德国、芬兰等国大学联合开设欧盟伊拉斯莫（Erasmus Mundus）“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硕士项目，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以全面合作伙伴（Full-Partners）身份全面参与伊拉斯莫项目的招生、教学和管理工作。2012年，入选教育部国别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成为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之一。2013年，在成功举办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的基础上，全英文教学国际博士项目顺利招生，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乃至教育学科第一个开设国际博士教育项目的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基本使命是：1. 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 为文化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3. 积极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工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4. 积极开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引进和传播国际先进理念和教育经验，把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教育研究的新发现推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构，语种涵盖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世界主要语种，研究对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芬兰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教育比较、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政策与管理比较、教育思想比较、文化与教育发展比较、国际教育等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领域。

50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一直是我国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的重镇。该院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积极承担起国家重

大教育研究任务，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套《国际教育前沿丛书》就是近年该院承担的部分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把《国际教育前沿丛书》列为“985工程”重点项目予以支持，山西教育出版社在丛书编辑和出版过程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刘宝存



全球化渗透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今天，使年轻一代具有全球胸怀，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成为各国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理解教育在这方面的特殊使命使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也不例外。但是，与全国方兴未艾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相比，理论研究严重不足，无法及时解决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国际理解教育看似简单，却包含庞杂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囊括了“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应具备的所有能力”的培养，有必要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厘清概念边界、建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

例如，国际理解教育目标之一的“全球公民”培养，目前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被频频提及，但对“全球公民”的概念和性质却少有深论，导致目标模糊、内容矛盾、实践方法不当。德里克·希特（Derek Heater）分析存在2500年之久的“全球公民”思想谱系，认为全球公民的倡导者“……（他们）相信必须有超越国家的政治权威和行动”^①，而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则认为：“良好的国际公民……必须把国际社会的福祉放在对自身国家利益无尽追求的优先地位，把秩序

^① [英]德里克·希特. 何谓公民身份[J]. 郭忠华,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141.

的持存放在满足最低限度的国家利益的优先地位。”^①从上述对“全球公民”特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全球公民”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维护本国利益、形成国家认同为出发点的“合格国民”的概念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主体对“全球公民”的不同定位仍使其在国际理解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争论乃至冲突。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围绕国际理解教育出现争论，主张实施“全球教育”的改革派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应使学生形成超越国家，以全球为己任的普世价值，而主张全面禁止全球教育的保守派则认为这样的全球教育只能让美国陷入亡国的危险。日本的公民教育中也有学界与官方两种立场，主张培养“全球公民”为目标的国际理解教育学会、全球教育学会和试图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文部省之间围绕国际理解教育存在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②

随着我国纳入全球化版图以及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正式提出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热点。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不免出现概念混乱、教育目标不清、教育内容带有随意性等问题，建构我国本土化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论体系时不可待。作为基础研究，本书试图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部分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以求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由于各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所用名称、概念边界、关注的问题和政策体系各不相同，本书并不统一体例，只是试图对以下内容进行梳理：①国际理解教育在研究对象国的名称、概念及理论边界；②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③国际理解教育的政策现状；④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困境。

1. 研究对象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政策特征

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其国

① [英]德里克·希特. 何谓公民身份[J]. 郭忠华,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142.

② 姜英敏. 东亚国际理解教育价值冲突探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0(5): 67.

际理解教育理念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主权国家间相互理解和合作”阶段（1946—1974）。国际理解教育主要以增进各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各国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为目标。第二阶段为“全球意识培养”阶段（1974—1994）。该阶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4年在第18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及教育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建议》为标志，主要特征是强调全球意识的培养。在该阶段，国际理解教育几乎包括了所有相关的重要内容，如人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人口教育、环境教育、和平教育、国际问题研究等。第三阶段为“探索普遍价值”阶段（1994—2001）。1994年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提出的《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之行动纲领》为其标志，该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特征是将和平、人权、民主视为人类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和教育之终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人类的“普遍价值”。第四阶段为倡导多样性共生阶段（2001—至今）。2001年的“9·11”事件使国际理解教育进入反省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倡导“多样性与共生”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而在国际理解教育纷纷被编入世界各国全球化应对体系的大环境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各种宣言、建议、合作学校的实践提醒各国，国际理解教育无论形势、价值观有多少改变，但最终目的终究是世界和平，“和平文化”是其最核心理念所在。

美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70年代的蓬勃发展过程、80—90年代的论争过程和21世纪的多元化发展过程。美国国际理解教育的特征是早在数十年前就意识到全球教育所标榜的“全球意识”的培养与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合格国民”教育之间所具有的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不同主张的群体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长期争论。从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持不同政见的政府会对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产生不同影响，也因此影响到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属于国际理解教育范畴的概念有“多元文化教育”。加拿大接纳移民，要求移民同化、一体化再到后来的多元文化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使其在全球化时代能够稳步应对国民成分愈加复杂的问题。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由于其特殊的

历史背景，始终保持两条清晰、平行的路线。一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文化为核心理念、以全球公民教育为目标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论体系；二是以文部省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全球化对策为主线的理论体系。前者强调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念下的“全球公民”教育目标，而后者要培养的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日本人。韩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推行主体分为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政府，所推行的国际理解教育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共性在于从其发端、发展和实施方面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官方色彩，都强调国民性前提，追求“合格国民”基础上的“全球公民”。

2. 研究对象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启示

在对各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特征进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也梳理了对我国相关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对今后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研究应关注的经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发起者，对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下设的国际教育局、亚太地区价值教育联合会等国际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世界认识到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本国学校教育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国际理解教育推行60余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通过建议、宣言等形式向世界推出与时俱进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又始终坚持以全球、全人类利益为立足点、世界和平为终极目标。最后，在提出纲领性、方向性建议的基础上，上述国际组织还通过“合作学校项目”、出版教育材料、组织教师培训等形式为世界各国践行国际理解教育做出了不遗余力的贡献。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国际组织所提倡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从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到具有全球意识的“全球公民”，再到现在的“普遍价值”，越来越超越国家框架，因此也导致各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带来种种矛盾和争议，其争议主要围绕国际理解教育应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念还是应针对本国国际化需要而展开，即教育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

争。争议的结果体现出各国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诠释,也导致世界各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较早的国家之一,国际理解教育多被称为“国际教育”“全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早在1948年全美教育协会发表的《美国学校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报告书中就出现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萌芽。但是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才在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中提出要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合格公民,并作为其途径和方法强调所有公民——不同种族、文化归属、经济地位、家庭背景的公民——平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这种尊重文化多样性、争取公民平等文化权利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相一致。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苏联解体、欧盟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加快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巨变,影响最大的就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成为美国国际政策的转折点。^①在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美国的相关学者和组织开始认识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支撑的国际理解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美国自21世纪开始就致力于通过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来增进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可以说在21世纪后美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出现了方向性转折,从过去基于全球视野,强调普世价值到今天更加强调尊重多样性。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21世纪以来,美国不少州通过召开会议、颁布法令、决议和政府报告以支持国际理解教育,同时成立州联合会或专门工作小组来保证其有效实施。^②美国的政策发展经验显示,以解决国内问题为目标国际理解教育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将显现时代局限性,学生的全球胸怀和全球共生能力的培养是近年国际理解教育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美国旷日持久的国际理解教育论争过程也说明,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澳大利亚的国际理解教育深受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影响,以“多

① Shashi Tharoor. The Global Centry[M]. American Scholar 2002: 71. No.1 (Winter): 66-68.

② Colin Powell. U. S. Secretary of State[R]. State Institute Report, 2003.

元文化教育”作为其主干，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白人移民后代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伴随全球化大潮来到澳大利亚的后期移民与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达到国内多种族、多文化之间的共生。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却是曲折的，不同政见的政府提出不同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尤其是怎样看待历史上原住民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个分歧的焦点，也深刻影响着澳大利亚以多元文化教育为核心的国际理解教育。对于同样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来说，怎样使不同时代、地域、种族的移民之间保持和谐关系，从而确保加拿大国民的国家认同，是国际理解教育的首要目标。为此，加拿大的国际理解教育也以“多元文化教育”的面目出现。此外，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并没有硬性规定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感的培养，而是在强调尊重族群认同的前提下，通过语言类课程、文化类课程的具体实施来形成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方法一方面尊重学生的民族认同，使得他们有意愿继承和保留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本民族是受尊重的族群，能感受到本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和权利，最终有利于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另一方面，通过使学生学习关于国家的共性知识，让各族群的学生都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所处的地区、国家的基本知识，进而对多元文化的社会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同时通过各种国家纪念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感，从而形成国家认同感。对存在民族共生需求的国家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的不二选择，而“尊重文化权利”的共生前提是需要对文化权利的边界及其保障模式进行界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是探索多元文化教育本质的宝贵参考。

日本和韩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则具有典型的亚洲特征——产生和发展都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却与政府的推行意图有所相悖，出现了遵循国际组织理念的国际理解教育模式和作为国际化应对政策的国际理解教育模式，两者之间既有交集又各不相同，呈现出两条清晰的主线。这也导致两国的相关研究、政策、实践出现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紧张，尤其是作为国际理解教育出发点的全球公民与爱国国民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些问题也可能成为我国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题，从而必须加以重视，加强相关研究。

总之，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方兴未艾，理论研究刚刚起步，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讨论并得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结论。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论进行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本书由诸位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同仁合作撰写，本书第一章由刘海霞，第二章由王雪颖、王明明，第三章由陶丽君，第四章由高春华，第五章由王威负责撰写，第六章、序和整稿的修改、校对工作由姜英敏负责。由于写作的时间仓促，加上我国在该问题上缺乏可资借鉴的先行研究，不免有诸多纰漏，还望得到各位读者的斧正。